

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

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

张懋镠 主编

晋南地区卷

刘树满 著

科学出版社



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

张懋镕 主编

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

晋南地区卷

刘树满 著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. 晋南地区卷 / 张懋镕主编; 刘树满著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16. 11

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

ISBN 978-7-03-050746-4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②刘… III. ①青铜器(考古)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K876.4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4358号

责任编辑: 李 茜 / 责任校对: 邹慧卿

责任印制: 肖 兴 / 封面设计: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
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6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: 787×1092 1/16

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: 26 1/4 插页: 1

字数: 620 000

定价: 209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编写缘起

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，多卷本的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即将出版。回顾往事，真是百感交集。

30年前，我的处女作《释“东”及与“东”有关之字》发表，从那时候起，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。

29年前，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。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，如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、简牍帛书文字。先生告诉我：“你在陕西，陕西有很多青铜器，你就做金文研究吧。”在先生的指导下，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，这令我终生受益。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《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》。所谓综合研究，就是从青铜器、古文字、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。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。

1989年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——博物馆专业，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，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。除了继续讲古文字，又开了一门新课“青铜器鉴定”。自此之后，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，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。

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，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。

概而言之，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，自两宋以来，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，在青铜器的分期、分区系、分国别、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，为世人所瞩目。

回顾历史，也毋庸讳言，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，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。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：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？（尚且没有涉及兵器、工具、车马器、钱币、铜镜等）几万还是十几万，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，专家也说不清楚。家底不清，研究对象模糊，研究很难继续深入。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，其收集、整理并非易事，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。说到研究，比如青铜器的定名，鼎、鬲、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，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，器物、纹饰、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，其研究或不够系统，或不够深入，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。

2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，写了《西周方座簋研究》《两周青铜盨研究》《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》《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》《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》等文章，希望从器类、断代、地域、定名等多个角度

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。

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，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，我经常地反复阅读，受益无穷。

在研究中，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。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，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：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，我就请他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，整理、研究某一类青铜器，或某一类纹饰，或某一时段的铭文，等等。经过十多年的积累，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。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，某一地区、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、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。这些为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的编撰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，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。

前几年，在编写《青铜器论文索引》的过程中，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。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，很感兴趣，遂与我商定，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，由我主编，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，形成一套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。如今，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，计划得以重新实现，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。

写作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的目的拟在全面、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，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对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、铭文、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，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、发展、消亡的基本途径、规律、特点及其原因。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，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。

由于这套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，眼界有限、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。我的指导也很有限，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。当时作学位论文时，我希望他们放大胆子去写，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。但无论如何，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，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、交流中，我也有很多的收获，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。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，作为序言放在书前，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，将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》延续下去。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，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，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
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，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。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，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编辑的辛勤工作，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。

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镛写于
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

青铜器轻重论

——从诸侯国青铜器的轻重谈起（代序）

张懋镕

在《再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》中（以下简称《再谈》）^①，我举例曾侯、康侯、晋侯、燕侯、鲁侯、应侯的青铜器的重量数据，来证明曾侯青铜器的胜出之处，进一步说明曾国是西周早期的一等大国。

去年我在为《吉金石刻编》所作序言中谈到^②，现在新出的不少考古文物报告和青铜器著录书，常常漏写器物的重量。或以为有尺寸就可以了，殊不知通过重量，方能测知器物的厚重或轻薄，不仅有利于器物的断代和辨伪，更重要的是重量体现了青铜器的自身价值。在夏商周时期，作为青铜器主要原料的铜、锡是紧缺的物资，商王朝却为了一件司母戊方鼎，舍得消耗重达875千克的铜和锡。为什么不用这些原材料制作体量小一点的但数量更多的青铜鼎呢？值得思考。楚庄王问九鼎之轻重的故事，很能说明问题。在青铜时代，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乐器，是当时礼乐制度的物化。青铜礼乐器的轻重大小，既是不同等级的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，也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尺度。所以青铜器的轻重也是重要的信息，不应欠缺。关于青铜器的重量，自古以来青铜器的著录书就很重视，从北宋吕大临《考古图》到清末刘喜海的《长安获古编》（胡琨整理本）都有重量方面的记载，可见重量数据的意义和价值。鉴于青铜器重量方面的研究很少，本文打算作一点论证。

一、从重量看西周诸侯国的实力

刘树满的《晋南地区卷》通过大量青铜器的数据，来比较晋国与周边小国以及晋

① 张懋镕：《再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6年第3期，74～79页。

② 张懋镕：《吉金石刻编·序》，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（第五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386、387页。

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的品质，期望勾勒出晋国及晋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及特征^①。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。本文原先打算从青铜器重量的差异来分析晋南地区诸国的实力，遗憾的是大部分青铜器没有重量的记载，这个愿望落空了。接下来能做的是检视包括晋国在内的诸侯国青铜器的重量，看看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，从一个方面来测知诸侯国的实力。以下将西周时期姬姓诸侯国的主要青铜器的重量数据列举。

方鼎：叶家山M111出土曾侯作父乙方鼎，通高49厘米，重22.2千克，无疑是目前所见分量最重的西周早期诸侯国国君的青铜器^②。M28出土曾侯方鼎，通高20.8厘米，重2.45千克^③。M28出土曾侯谏方鼎，通高23.6厘米，重2.71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098）^④。M65出土曾侯谏方鼎，通高23.6厘米，重2.84千克^⑤。传世康侯丰方鼎通高27.8厘米，重5.16千克（《商周》01575）^⑥。

分裆鼎：叶家山M28出土曾侯谏分裆鼎两件，一件通高22.5厘米，重2.5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096），一件通高23厘米，重2.3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100）。传世应公分裆鼎两件，一件通高18.0厘米，重1.75千克。一件通高18.4厘米，重1.69千克（《商周》01430、02071）。传世燕侯旨分裆鼎通高20.4厘米，重1.9千克（《商周》02203）。

圆鼎：叶家山M28出土曾侯谏鼎，通高29.4厘米，重3.76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099）。M3出土曾侯谏圆鼎通高29.5厘米，重4.14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101）。M65出土曾侯谏圆鼎通高28.9厘米，重3.98千克^⑦。传世燕侯旨圆鼎通高17.2厘米，重1.16千克（《商周》01716）。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应侯鼎，通高21.6厘米，重2.8千克^⑧。

甗：叶家山M28出土曾侯甗，通高50.6厘米，重17.34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

① 刘树满：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晋南地区卷》，简称《晋南地区卷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。

② 关于此器的重量，相关资料没有公布，承蒙胡刚博士函告，谨表谢忱。

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3年第4期，8页。

④ 吴镇烽：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，本文简称《商周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。

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1年第3期，10页。

⑥ 吴镇烽：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，本文简称《商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

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1年第3期，10页。

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572页。

0270)。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应侯甗，通高44厘米，重9.1千克^①。

鬲：叶家山M28出土曾侯鬲，通高15.5厘米，重0.78千克^②。1927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鲁侯熙鬲，通高17.1厘米（《商周》02876）。

簋：M65出土曾侯谏簋高17.5、口径22.4厘米，重3.53千克^③。M28出土曾侯谏簋，高17.8、口径21厘米，重3.31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338）。曾侯作媿簋，通高13.3、口径17.9厘米，重2.66千克^④。传世应公簋两件，一件高12.8厘米，重2.14千克（《商周》04210）。一件高12.5厘米，重2.33千克（《商周》04211）。应侯再簋通高22.5、口径18厘米，重3.98千克^⑤。应侯见工簋，通高25.5、口径21.5厘米，重7千克^⑥。

盥：应侯盥通高23.8、口长22.6厘米，重6.25千克（《商周》05503）。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应侯再盥，通高22.4厘米，重7.5千克^⑦。晋侯对盥通高22.2厘米，长口26.7厘米，重5.2千克（《商周》05630）。晋侯对盥通高16.2~17.8厘米，长口21.3~22.1厘米，重2.78~3.22千克（《商周》05647-50）。

盃：叶家山M28出土的曾侯谏盃，通高30.0厘米，重4.59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966）。琉璃河M1193出土燕侯克盃，通高26.8厘米（《商周》14789）。应侯盃，通高25.5厘米（《商周续编》0967）。

罍：叶家山M28出土的悬铃罍通高44厘米，重7.4千克。虽然这件罍上没有曾侯的字样，但这样高大的器物应为国君所专用。琉璃河M1193出土的燕侯克罍通高32.7厘米（《商周》13831）。

壶：叶家山M111出土带鋡曾侯壶，通高40.3厘米（《商周续编》0808）。M65出土曾侯壶，带提梁高44厘米，重5.94千克^⑧。M28出土曾侯谏作媿壶，通高46.5厘米，

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574页。

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3年第4期，18页。

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1年第3期，16页。

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3年第4期，15页。

⑤ 《保利藏金》编辑委员会：《保利藏金》，岭南美术出版社，1999年，73页。

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737页。

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576页。

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1年第3期，26页。

重3.31千克^①。传世应公壶通盖高27.1厘米，重2.79千克（《商周》12171）。应侯壶两件，一件通高54.3厘米，重15.5千克，一件通高55厘米，重16.1千克^②。

卣：叶家山M111出土曾侯卣，通高36厘米（《商周续编》0857）。M28出土曾侯谏作媿卣甲，带提梁高43.4厘米、通盖高39.6厘米，重7.85千克^③。曾侯谏作媿卣乙，通高34.8厘米，重5.0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872）。传世应公卣通高20.8厘米，重2.7千克（《商周》13049）。燕侯旨卣，通高34.5厘米（《商周续编》0874）。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应侯再卣，通高20.6厘米，重2千克^④。

尊：叶家山M28出土曾侯谏作媿尊，通高30.2、口径23.8厘米，重4.49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781）。传世鲁侯尊通高22.2、口径20.7厘米，重4.1千克（《商周》04955）。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应侯再尊，通高16.7厘米，重1.55千克^⑤。

盘：曾侯盘，高11、口径30厘米（《商周续编》0918）。曾侯谏盘，高14.8、口径33.6厘米，重4.49千克（《商周续编》0927）。应侯盘，通高13.3、口径34厘米，重5.15千克^⑥。

综上所述，将曾、卫、燕、应、晋、鲁等姬姓诸侯国国君的青铜器相比，曾侯的青铜器不仅要高大许多，而且分量也要重一些。虽然西周早期卫、燕、应、晋、鲁等姬姓诸侯的青铜器由于种种原因，发掘与存世的器物不多，但依据燕侯、应侯墓葬规模逊于曾侯烝墓葬的事实，卫、燕、应、晋等姬姓诸侯与曾侯青铜器之间存在着差距，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有些曾侯青铜器如方鼎、壶、卣要比卫、燕、应、晋、鲁等姬姓诸侯的器物高出十几甚至二十几厘米，说明曾侯青铜器尤其是曾侯烝的青铜器可能要高出一个层次。卫、燕、应、晋等姬姓诸侯之间的青铜器体量比较接近，但也有差别。相比而言，应国的青铜器重量要轻一些。究其原因，除了诸侯国的实力和受到周王室的重视之外，与青铜原料获得的难易程度也有关系。这一点在《再谈》中已经申论，不再赘述。

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，尽管姬姓诸侯国国君的青铜器多半铸造得比较好，也有一

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3年第4期，37页。

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751页。

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博物馆：《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3年第4期，24页。

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583页。

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：《平顶山应国墓地》（上）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，581页。

⑥ 《保利藏金》编辑委员会：《保利藏金》，岭南美术出版社，1999年，113页。

定的分量，但比较同时期朝廷大臣的青铜器，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。譬如康王时的大盂鼎通高101.9厘米，重153.5千克，比曾侯作父乙方鼎重多了。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。显然这与当时周王朝奉行的“固本弱枝”的政策有关。

二、从重量分析青铜器发展的轨迹

在研究青铜器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每一类青铜器产生和发展以及衰落的轨迹。不仅器物的形态、花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演进的基本线索，就是凭借器物的重量，也可以测知这一点。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各卷本，在书稿或学位论文中都附有各种表格，从中可以看到诸多器物的背景资料，譬如出土时间、地点、尺寸大小。遗憾的是有些书稿有关于重量的记载，有些则缺乏。现将有较多重量记载的青铜器类别资料分析如下。

第一，从重量变化看青铜豆的发展历程。

张翀在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豆卷》中将青铜豆的发展分为八期^①。依次是：商代晚期，西周早期，西周中晚期，春秋早期，春秋中期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，战国中期，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。我们将第一、二期归为第一阶段^②。这是青铜豆产生和发展的初期，青铜豆不仅尺寸小，而且体轻量，如商代晚期的鬯豆重0.68千克（《商周》06101），鬲父癸豆重0.88千克（《商周》06108）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浅腹豆重1.72千克^③，子廌父丁豆只有0.38千克重（《商周》06111）。西周早期的豆体量与商代晚期差不多，如宝鸡竹园沟M13出土的史父乙豆只有0.65千克重（《商周》06109）。第二阶段包括三、四期，是青铜豆发展的过渡期，通高和重量都有变化，如西周晚期的周生豆重3.3千克（《商周》06141）。在西周中晚期，作为豆的一个分支的铺出现了。铺的体量比较大，如西周晚期的姜休母铺重3千克（《商周》06120）、晋侯对铺重3.01千克（《商周》06153），春秋早期的虢季铺重2.5千克（《商周》06144），曾仲旂父铺重量达到4.72千克（《商周》06130）。从第五期开始进入第三阶段，青铜豆发生显著变化，在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从配角变成主角，重量也随之增加不少。大部分青铜豆的重量在2千克以上，如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的蟠虺纹豆4

① 张翀：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豆卷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40页。

② 张懋镛：《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形演变与功能转化的互动关系》，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（第四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179、180页。

③ 江西省博物馆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新干县博物馆：《新干商代大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，62页。

件,重量在2.12~2.53千克之间^①,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左使车工豆重3.35千克(《商周》06118),曾侯乙墓出土的浅盘豆重4.2~4.5千克(《商周》06126-27),同墓出土的兽形环纽豆更重达5.9千克(《商周》06125)。到了战国晚期,随着青铜器的衰落,青铜豆的重量也由此大减,如王子申豆只有2.26千克(《商周》06160-61),铸客豆重2.34千克(《商周》06133)。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中期的厚氏元铺两件,一件重7.24千克(《商周》06154),一件重7.56千克(《商周》06156),远超一般的簋的重量,与方座簋的平均重量相伯仲,可见豆在春秋以后取代簋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。诚然,由于重量方面的资料极其欠缺,无法做比较细致的研究,但由以上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,重量的增加对于青铜豆发展的意义。

第二,从重量变化看青铜壶的发展历程。

我们依据青铜壶的发展态势,划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从商代早期到西周早期,第二阶段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,第三阶段从春秋中期—战国晚期^②。

青铜壶自商代早期开始出现,在重量方面就有不凡的表现。如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的兽面纹壶就有10.4千克之重。到了商代晚期,青铜壶分量进一步增加,如1976年安阳小屯M5出土的妇好壶两件,重18.4千克(《商周》11999-12000),后粤母方壶两件(《商周》12031-32),重量分别为35与31千克。青铜壶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有那么重的分量,无疑提高了青铜壶在墓葬出土酒器组合中的地位,这为青铜壶日后取代其他酒器而一枝独秀积累了资本,奠定了基础。

青铜壶进入西周中期以后,数量虽然减少,但出现了一些大型青铜壶,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引人注目。譬如1955年河南泌阳县前梁河村出土尚壶两件,重8.65千克(《商周》12302-03)。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窖藏出土仲南父壶两件,重量分别为14.28与13.08千克(《商周》12329-30)。1976年陕西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窖藏出土三年癸壶两件,重量分别为26与26.7千克(《商周》12441-42);出土十三年癸壶两件,重15.51千克(《商周》12436-37)。以上青铜壶年代在西周中期。西周晚期的青铜壶有:196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乡齐家村窖藏出土几父壶两件,重量分别为16.86和17.25千克(《商周》12438-39)。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乡西段村出土匄车父方壶两件,重量分别为13.5和12.9千克(《商周》12237-38)。传河南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应侯壶两件,重量分别为15.5和16.1千克(《商周》12265-66)。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单五父方壶两件,重量分别为25和25.5千克(《商周》12349-50)。传世蔡侯壶的重量是30.75千克(《商周》12377),颂壶的重量是32.41千克(《商周》12451),与前

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:《太原晋国赵卿墓》,文物出版社,1996年,36~38页。

② 张懋镛:《青铜壶缘何一枝独秀——兼论商周青铜器的生命力问题》,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(第五辑),科学出版社,2016年,296~301页。

述妇好墓出土青铜壶的重量相仿佛。如果将来发现西周周王及王室成员的青铜壶，其重量一定会超出商王室成员的青铜壶的重量。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西周中晚期是青铜壶发展的低谷期。

以往通常认为春秋早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低谷时期，但实际上春秋早期是青铜壶的繁盛期，不仅数量多，从青铜壶的重量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证。如1990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虢季方壶两件，重10.5千克（《商周》12221-22）。2007年陕西韩城市梁带村M26出土仲姜方壶两件，重14.92千克（《商周》12247-48）。1966年湖北京山县苏家垅出土曾仲旂父方壶两件，重30.1千克（《商周》12285-86）。2002年山东枣庄市东江小邾国墓地M2出土邾君庆壶两件，重11.8千克（《商周》12333）。传世器如芮公方壶两件，重量分别为9.21和9.45千克（《商周》12244-45）。

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，是青铜壶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时期，这在重量方面也有极佳的表现。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申方壶两件，重量为24.85千克（《商周》12187-88）。传世的莲鹤方壶两件，重量为64.28千克。以上是春秋晚期器。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曾姬无卣方壶两件，重量分别为25.14与28.34千克（《商周》12424-25），是战国中期器。1977年河北平山县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壶重28.72千克（《商周》12455），也是战国中期器。最重的青铜壶可能是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联壶两件，重量分别为106与99千克（《商周》12208），可称得上壶王，年代在战国中期。战国中期以后，随着青铜器的衰落，青铜壶也一蹶不振，再无大器出现，重量也每况愈下。

总而言之，青铜壶的发展随着壶的重量的增加在节节攀升。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，青铜壶不仅始终是酒器组合中的核心，也一直是各个历史阶段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，显示出青铜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三、从大小轻重来区分不同的器类

在青铜器研究中，常常会看到将器类混淆的现象。如误将盆认作盂，或者将盂视为盆；将卣误为壶，或者将壶认作卣；将鬲误作尊，或者将尊视为鬲；将敦误作鼎，或者将鼎误为敦。研究者试图从形制、纹饰、铭文等各个方面，用各种方法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，但有时并不很成功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想提出另一种区分不同器类的方法，就是重量区分法。鼎、簋、爵、觚等每一类青铜器都拥有几十、几百甚至几千件器物，有大的也有小的，有重的也有轻的，似乎很难用大小重量来区分不同的器类。不过我们注意到，并非没有规律可循，不同的器类在重量方面有不同的倾向性表现，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来将它们区分开来。

譬如盂与盆的区分就颇为纠葛。何者为盂，何者为盆，学术界意见分歧。很多论

著已注意到孟的体量较大，大部分孟高度在35厘米以上，而盆是一种较低矮的器类，高不过十几厘米，于是用尺寸大小来区分盆与孟。但是对于部分孟与盆来说，用尺寸大小来区分效果不明显，如果同时考虑到重量方面的不同，区分起来会容易一点^①。

且将大家公认的孟的重量公布如下：

好孟（《商周》06201），32.9千克。亚长孟（《商周》06203），25千克。亚长孟（《商周》06204），12.9千克。寝小室孟（《商周》06205），41.8千克。伯孟（《商周》06206），12.2千克。燕侯孟（《商周》06209），6.45千克。丹叔番孟（《商周》06213），11千克。天孟（《商周》06218），34.5千克。伯孟（《商周》06222），35.8千克。永孟（《商周》06230），36千克。

且将大家公认的盆的重量公布如下：

吞盆（《商周》06251），5.75千克。微癸盆（《商周》06252），5.996千克。曾太保庆盆（《商周》06256），2.23千克。曾孟聿谏盆（《商周》06264），2.014千克。善夫吉父盆（《商周》06223），7.6千克。

从以上数据可见：孟的重量在41.8~6.5千克，绝大部分在10千克以上。盆的重量在7.6~2.014千克，基本上在6千克以下。两者相比，很清楚，孟的重量通常是盆的两倍以上，甚至能达到10倍以上。

我们曾经论证所谓虢叔孟（《商周》06210），虽然自铭为孟，但实际上是盆^②，一个原因也与重量有关。此器通高18.8、口径34.7厘米，在青铜盆中属于大器，但重量为4.98千克，还是在盆的重量范围内。相似的例子还有婁君盆，虽然其铭曰“自作饋孟”（《商周》06226），但还是盆。通高12.8、宽33.2厘米，尺寸也不算小，但重量只有2.28千克，即便在青铜盆中也只能算是小盆了，又如何称得上孟呢？虢叔盆和婁君盆之所以自称为孟，一是因为相生关系，与孟关联紧密^③，二是因为这两件盆形体比较大，与孟接近，遂顶了孟的名字。

其次谈谈卣与壶的区分。

在《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：组合关系定名法——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》一文中^④，我们提出了区分壶与卣的六条标准：

第一：有提梁。凡是归为青铜卣者均有提梁。当然有提梁的未必都是青铜卣，因

① 张懋镠：《青铜盆小议》，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（第二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128~132页；《再议青铜盆——从新发现的中市父盆谈起》，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（第三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164~169页。

② 张懋镠：《试论纹饰对青铜器定名的意义》，待刊。

③ 张懋镠：《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》，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（第二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133~135页。

④ 张懋镠：《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：组合关系定名法——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》，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（第五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313、314页。

为提梁壶也有提梁。而青铜卣与提梁壶的区分，则可以用以下几个标准来区分。

第二：青铜卣形体矮胖，短颈硕腹。相比较，提梁壶颈部要长些，腹部要瘦些。

第三：青铜卣的盖为母口。而大部分提梁壶的盖为子口。

第四：青铜卣的口部、腹部横截面基本上是椭圆形，壶的口部、腹部横截面多为圆形。

第五：使用组合形式定名法。从尊与卣的稳定组合中去鉴别何者为卣，何者为壶。什么器物与尊相配置是固定的，它真切地反映出这些器物在古人眼里叫什么名字，具有怎样的功能。

第六：装饰手法有所不同。如壶上装饰十字环带纹，而卣不装饰这种纹饰。绝大部分卣在颈部装饰浮雕兽首，而壶的颈部很少装饰浮雕兽首。

其实除了以上六条标准，需要补充的是利用重量的差异也可以判断何者为卣，何者为壶。相对而言卣比较轻而壶比较重。为此我们收集了从商代早期到西周中期壶和卣的重量数据，制成两份表格（见附表1和附表2）。

从附表1可知：商代晚期早段壶的平均重量为20.89千克。商代晚期晚段平均重量为4.88千克。西周早期平均重量为3.13千克。西周中期平均重量为13.94千克。32件壶的总重量为307.82千克，平均重量为9.62千克。

从附表2可知：商代晚期早段卣的总重量为4.6千克，平均重量为1.53千克。商代晚期晚段总重量为115.86千克，平均重量为3.62千克。西周早期总重量为174.24千克，平均重量为3.96千克。西周中期总重量为14.78千克，平均重量为2.46千克。86件卣的总重量为309.48千克，平均重量为3.64千克。

从以上两组数据不难判断：壶重而卣轻。前者重量是后者的两倍多。因为差距比较明显，所以可以用重量的大小来判断某一件器物究竟是壶还是卣。

试以筒形提梁卣的归属为例。马军霞博士在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卣卷》中认为筒形提梁卣是卣^①，而裴书研博士在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壶卷》中认为是壶^②。王辉先生则表示筒形提梁卣不能算作卣，它与汉代的鍑相仿，应命其为鍑，从卣中排除出去^③。我们认为应将筒形提梁卣归属为卣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：壶重而卣轻。有意思的是筒形提梁卣的重量比较轻，陕西宝鸡竹园沟M13出土的两件筒形卣的重量分别是3.33千克与1.95千克，远远低于青铜壶的平均值，与青铜卣的平均值接近。遗憾的是能提供重量数据的筒形卣太少，我们的结论还很粗浅。

再谈谈彝与尊的区分。2004年，张小丽在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《商周青铜尊研

① 马军霞：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卣卷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46页。

② 裴书研：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壶卷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76、77页。

③ 王辉：《卣之定名及其他》，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，382页。

究》(以下简称《张文》)中,将二里冈期和殷墟一期出土的小口、广肩、深腹的盛酒器归入青铜尊范围内^①。2010年,王宏在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《商周青铜罍研究》(以下简称《王文》)中,持不同意见,认为这种小口无耳折肩型式的盛酒器是罍而不是尊^②。为此,我们曾经著文,用组合关系定名法来区分尊与罍^③。如今我们想到也可以从重量方面来审视尊与罍的差别。考虑到尊与罍的数量很多,但有重量记载得不多,拟同时从高度与重量两个方面来考察罍与尊的不同。

首先,比较商代晚期出土的罍与尊在通高方面的差别。由于王宏的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罍卷》一书缺少关于罍的重量资料的整理^④,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罍与尊的通高数据来做比较。考虑到尊在西周初年以后高度有降低的趋势,与同时期罍的高度有明显差别,纳入比较范围可能有失公正,所以我们只是将商代晚期出土的罍与尊的高度进行比较。根据《青铜罍卷》统计的数据,商代晚期出土的罍共有54件,经我们计算,平均高度40.99厘米;根据《张文》统计的数据,商代晚期出土的尊共有76件,经我们计算,平均高度34.11厘米。罍的平均高度要超出尊6.88厘米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,可供我们鉴别时参考。

考虑到圆罍与圆尊在形体上较为接近,可比性更高,故采用《商周》一书有关于商代圆罍和圆尊的通高和重量数据,作如下统计:

罍:

- (1) 爰罍(《商周》13706),高38.6厘米,重7.45千克。
- (2) 丙罍(《商周》13721),高43厘米,重13.29千克。
- (3) 𩰫罍(《商周》13723),高46.5厘米,重13.22千克。
- (4) 亚址罍(《商周》13737),高44.8厘米,重14.2千克。
- (5) 甲罍(《商周》13755),高54厘米,重13千克。
- (6) 日癸罍(《商周》13756),高45.9厘米,重15.2千克。
- (7) 马危罍(《商周》13757),高42.5厘米,重8.35千克。
- (8) 冉父乙罍(《商周》13772),高44厘米,重9千克。
- (9) 山父己罍(《商周》13774),高43厘米,重9.7千克。

平均器高44.7厘米,重11.49千克。

尊:

- (1) 冉尊(《商周》11112),高22.7厘米,重3.11千克。

① 张小丽:《商周青铜尊研究》,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4年。

② 王宏:《商周青铜罍研究》,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0年。

③ 张懋镛:《再论青铜器组合关系定名法——以尊、罍、甗的区分为例(代序)》,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罍卷》,科学出版社,2016年。

④ 王宏: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罍卷》,科学出版社,2016年。

- (2) 串尊（《商周》11115），高23.4厘米，重3.69千克。
- (3) 庚丙尊（《商周》11118），高37厘米，重7.35千克。
- (4) 𩚑尊（《商周》11158），高30.8厘米，重9.4千克。
- (5) 𩚑尊（《商周》11161），高34.8厘米，重8.69千克。
- (6) 子渔尊（《商周》11205），高36.7厘米，重6千克。
- (7) 危耳尊（《商周》11246），高22.5厘米，重3.17千克。
- (8) 子束泉尊（《商周》11292），高32.5厘米，重8.5千克。
- (9) 子束泉尊（《商周》11293），高33.2厘米，重8.1千克。

平均器高30.4厘米，重6.45千克。

从上述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圆罍与圆尊的区别：第一，高度有差别。罍与尊都是大型的盛酒器，但稍加分辨，就可以发现两者大小还是有区别的。圆罍高度在38厘米以上，而圆尊高度在38厘米以下。圆罍的平均高度是44.7厘米，圆尊的平均高度是30.4厘米，也就是说圆尊平均比圆罍低14.3厘米。第二，重量不一样。罍要比尊的分量重。圆罍重量在7千克以上，而大部分圆尊重量在8千克以下。圆罍平均重11.49千克，圆尊平均重6.45千克，圆罍比圆尊平均重5.04千克。

需要说明的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圆尊即后鲁母尊（《商周》11290）后鲁母尊（《商周》11291）没有计算在内，因为它们是商王妃的器物，级别特别高，自然要比其他贵族的器物要高得多，也重得多。前者高47厘米，重23千克，后者高46.7厘米，重23.5千克。但即便计算在内，也不会颠覆我们的结论。计算结果是圆尊平均器高33.4厘米，重9.5千克。与圆罍相比，平均高度差11.3厘米，重量差1.99千克，差别还是不小。

且以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和洋县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圆罍与圆尊为例。先看罍的通高与重量。1980年城固龙头出土罍一件（1980CHLTT：1），通高37.8厘米，重10.18千克^①。1981年城固龙头出土罍两件，1981CHLTT：1罍，通高34厘米，重6.94千克。1981CHLTT：2罍，通高37.1厘米，重6.73千克^②。1990年马畅安冢出土罍一件（1990YMAT：6），通高36.7厘米，重9.36千克^③。1981年洋县张村出土罍一件（YZHCT：1），通高39.2厘米，重6.81千克^④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，罍的高度在34~39.2厘米，重量在6.73~10.18千克。

再看尊的通高与重量。1980年城固龙头出土尊两件。1980CHLTT：2尊通高23.8厘米，重3.21千克。1980CHLTT：3尊通高24.1厘米，重2.93千克^⑤。1974年五郎庙出土尊

①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、陕西省文物局：《城洋青铜器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1页。

②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、陕西省文物局：《城洋青铜器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27页。

③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、陕西省文物局：《城洋青铜器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162页。

④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、陕西省文物局：《城洋青铜器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176页。

⑤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、陕西省文物局：《城洋青铜器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2页。